

樸實無華 —— 懷念張光直先生

臧振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張光直先生過世，並不讓我感到驚訝，十多年來，看著他因為帕金森氏症而日益萎縮的身影，知道這一天終究會來到，雖然不斷地祈禱上蒼，請賜給我們一個奇蹟。

追隨張光直先生將近30年，除了在學問上受教甚多，得益匪淺，最讓我感受深刻的是張光直先生的風範和人格。他雖然在西方世界待了40多年，但是他的為人和處世卻仍然保有很濃厚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美德。他窮經皓首但不求名利，他學富五車但虛懷若谷，他堅持原則但通情達理，他望之儼然但仁愛溫和。這些都是在當今國內學術界中所盛行爭名奪利、傾軋爭鬥、淺薄自大和偏見自持的風氣中所不容易再看到的了。所以，張光直先生的過世，我哀悼的不只是一位學術大師的殞落，更有著典型已遠的失落和悲淒。

回想第一次看到張光直先生是在民國六十一年，當時他從美國回來籌劃「濁大計畫」。有一天下午，我和同學孫寶鋼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系館三樓的研究生研究室看書，宋文薰先生突然進來，身後跟著一人，清秀的面容，短潔的頭髮，加上樸素的衣著，像是個學生。宋先生指著這個人開口說：「他是張光直」。我們嚇了一跳，誰知眼前這位樸素的「學生」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張光直！不由得肅然起敬。樸實無華，是我對張光直先生的第一個印象。

張光直先生來找我們，目的是要組織濁大計劃的考古隊伍。由於這個機緣，使我能夠有幸追隨他在大肚溪流域做了長期的考古工作，獲得豐富的資料，完成了碩士論文，並得以留校工作，又轉入本所，成為史語所第一個專門研究台灣考古學的研究人員，以後又承張先生厚愛，收納為哈佛大學的博士研究生。

張光直先生對於年輕人的培養，只要是可造之材，都是盡其所能地給予機會。記



張光直先生與臧振華合影

得民國六十八年，我獲選為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和內人一同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在將近期滿的時候，張先生提示我應該試試繼續留下來讀書。在此之前，我是不敢有此奢望的，一方面是自忖學疏識淺，不足以進入這樣一個世界一流的大學，另一方面是哈佛的學費太貴，除非有獎學金，否則沒有這個經濟能力。現在受到了張先生的鼓勵，重新燃起了希望，於是向學校遞出了申請表。最後不但獲得了入學許可，並且得到哈燕社的攻讀博士學位獎學金。我相信，在這件事情上，張先生一定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以後，由於和張先生有較為密切來往，我知道他經常默默地協助許多優秀的年輕學子達成了赴美進修的願望。

張光直先生看起來很嚴肅，但是絲毫不會擺出大教授的架子，對待學生有如朋友。他從不疾言厲色，總是循循善誘，讓學生獲得足夠的尊重。記得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三十日，我和內人前往哈佛擔任訪問學人，抵達哈佛校園後，即直接到哈佛燕京學社報到。該學社的秘書Mary Smith女士（後來成為孔復禮教授的夫人）說張光直先生來過電話，交代我們到了就通知他。Mary通知了張先生，不一會兒，他就從斜對面的Peabody Museum趕了過來。他熱情地幫著我們提著沈重的行李前往我們所預租的住處，並幫著我們作了初步地安頓就離開了，好讓我們休息。

我和內人是第一次到美國，長途旅行，中間又發生轉機的延誤，加上時差，早已疲累不堪，張先生一走，就倒在床上睡去，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被門鈴聲驚醒，恍惚中開了門，原來是張先生又過來了。他說知道我們一定會大睡一場，但是怕我們會一直睡下去，調整不過來時差，所以下班後，故意繞過來叫醒我們，並要帶我們到他家吃晚飯。我們還睡眼惺忪，就一股腦地鑽進了他汽車的後座。在途中，張先生開玩笑地拿起原來放在車台上的一頂解放軍軟帽，大概是在大陸上買的，帶在頭上。說：「你們看，我像不像taxi driver呀」。我突然從睡意中驚醒，發現作了一件很不禮貌的事。我可以體會出張先生不是在開玩笑，而是要很委婉地提醒我們坐汽車的禮貌。在張先生開車送我們回來的路上，我自然不會再那樣失禮了。這個故事充分顯示了張先生平易近人的風範和教導學生的態度。

張先生做事情條理清楚，是有名的。記得在哈佛唸書的時候，看到他對於所有來往學者和學生的信件、資料和著作都設有個別的檔案。需要任何資料，他可以隨時從檔案櫃內拿出。這種保存和整理資料的功夫，實在令人佩服。如今這些井然有序的檔案，大都由張先生的家人捐贈給了波士頓大學東亞考古和文化史國際研究中心。一段時日後，都將成為學術史上一批非常重要的資料。當然張先生做事情的投入和認真更

不在話下，即使對於每天例行的上課都毫不馬虎。他上課不但不遲到，還總是要早到一些，獨自站在講台上沈默地等待學生。他不時看著捏在手裡的那隻老舊的手錶，時間一到，就開始上課。

張先生是一位坦誠而又具有真知灼見的人。民國八十三年他回來擔任本院副院長，很想將我們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國際化，所以他鼓勵以英文發表著作。為此，他受到了一些批評。但是他深知，只有讓外國人知道我們的研究成果，才能達成國際化的目的，因而並不介意。而當時台灣正值本土熱，本土化在政治上成為最響亮的口號，學術上也在跟進。張光直先生以中研院第一個人文學者出身的副院長，對於當時有不健康傾向的學術本土化提出了箴言：「要研究台灣，不但要研究台灣本土，而且如果要使台灣本土的研究有很高的水平和重要意義，就不能不研究中國大陸，也不能不和東南亞研究結合在一起，更不能不把所有這些研究，放在世界人類史的框框裡面。」他甚而更語重心長地指出「台灣本土的研究上，我們都是既強調要研究台灣本土，也不放棄研究中國與世界的主義者，我們絕對不能做台灣本土研究的義和團主義者。義和團的口號叫得很好聽，但那是亡國滅種的良法……。」（發表在《第一屆台灣本土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頁8）張先生就是這種秉持良知，不曲意迎合政治風潮，堅持開大門走大路的人。

有人以為張先生出生在北京，幼年在北京成長，對台灣也許沒有太多感情。其實張先生對於台灣是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他不但在前幾年所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中，以「蕃薯人」自居，即使早年在大陸發表文章所用的筆名，也是以台語音之「蕃薯」自稱。大陸出版的《考古》期刊，1979年刊出一個署名韓起的人所寫一篇文章〈台灣省原始社會考古概述〉，從這篇文章的內容來看，作者對台灣考古的內容非常熟悉，不是在台灣做過考古的人是寫不出來的，而大陸的考古家中又沒有一個叫作韓起的人。那麼誰是韓起呢？我曾推測這個韓起就是張光直先生，但從未得到他親口證實。我私下對張先生為什麼要用「韓起」作為筆名感到好奇，憶測也許是取自「韓愈」和「文起八代之衰」中的兩個字吧？這個謎底一直到最近才由張先生的胞兄光正先生透露出來。原來，「韓起」是取自台語「ㄏㄢˇ ㄉㄧˊ（蕃薯）」兩個字的音，他以「韓起」，讀如「ㄏㄢˇ ㄉㄧˊ」，就是自稱台灣人的意思。所以他始終是以台灣人自居，正因為對台灣的認同和關愛，他才會說出肺腑之言，也才會對台灣學術的本土化寄予更高的期待：「要採取既要用世界與中國的研究來對本土研究有所貢獻的決心，更要有強烈的用本土研究的心得與收穫去服務於全人類的志向與決心。」

最近，我到哈佛大學參加張光直先生的追思會，並到他在劍橋Mt. Auburn墓園中的墳前弔祭。遼闊的墓園，一小方石碑，上面鐫刻著：

KWANG-CHIH CHANG

張光直

ARCHAEOLOGIST

4.15.1931-1.3.2001

這個永遠令人懷念的考古學家，就安息在這塊碑下，一如他的生前，樸實無華。

